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二編

林慶彰主編

第6冊

古史辨《周易》研究評議

黃惠香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史辨《周易》研究評議／黃惠香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2+19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6 冊）

ISBN：978-986-254-648-2（精裝）

1. 易經 2. 研究考訂 3. 古史辨派

030.8

100015764

ISBN-978-986-254-648-2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 六 冊

ISBN：978-986-254-648-2

古史辨《周易》研究評議

作 者 黃惠香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十二編 55 冊（精裝）新台幣 9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古史辨《周易》研究評議

黃惠香 著

作者簡介

黃惠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碩士畢業。現任教於國立台中女中。
本書為九十六學年度畢業之碩士論文，由賴貴三博士指導。

提 要

本書欲對顧頡剛所引領之古史辨思潮，在《周易》研究中呈現的成果與樣貌進行評議，研究對象以《古史辨》第三冊上編為中心，旁及相關著作，本書內容概分為七章：

第一章緒論，簡釋本書命題，並進行文獻評述，表明研究動機，以及略述古史辨運動以概括背景，最後註明寫作方式。

第二章，論古史辨對《周易》研究方向的引導。由於古史辨本身具有觀念革命的性質，因此先將其所受源流、時代背景、治學方式等說明，並且突顯古史辨定調在破除經書權威，重視史料學與文獻考究，其《周易》研究最主要的觀點，乃在於「《易》為卜筮之書」與「經傳分觀」二者。

第三章，論古史辨與《周易》古史研究。古史辨對現代易學有一突出的貢獻，即是將古史和《周易》的連結加深、加強。本章先從〈易傳〉即有的「引史證易」的傳統談起，而後提出顧頡剛對「易中有史」的貢獻，以及余永梁、李鏡池對此一方向的耕耘和李氏對「易即古史」概念的發展。

第四章，論古史辨對「商文化和《周易》關係」之探討。古史辨學者前有未有的關注《周易》的起源，尤其殷墟甲骨的出土更激發此類研究的興盛，至今猶未衰歇。即使數字卦的確認、周原甲骨的發現、王家台秦簡《歸藏》的出土，仍難以回答古史辨當時提出的問題。特以此章識之。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次序安排，亦欲借以彰顯古史辨對歷史背景知識引入《周易》研究的用心。

第五章，論古史辨對《周易》經文的析論。

第六章，論古史辨對〈易傳〉的看法。由第五和第六章的章題上表明，古史辨對於《周易》經傳的價值評斷並不同，成見先行，就造成了古史辨的缺憾，有功於「經」，而有過於「傳」。筆者並於兩章結論處略抒所得，以求教於方家。

第七章結論，述古史辨《周易》研究上的成就和局限。以此總結。

誌 謝

「讀書是一輩子的事，學位只是里程碑」，這是賴老師貴三勉勵我的話，當時我學業才起步，卻必須提早進入職場，離開台北。這幾年來，賴老師不因我的怠惰惶惑而加責，寬厚體諒，靜心等待我的成長，至今不負所望，始於艱難，竟能克終，深謝賴老師對我付出的關懷和指導。接受口試時誠惶誠恐，口試委員孫劍秋老師、趙中偉老師的藹然點撥，多有溢美，使我大減畏懼之意，並得到修正的機會，真的非常感謝兩位學者對後輩的寬愛。身為人師之後，更明白能被許多老師指點是幸福的，回想大學時代以來，因高秋鳳老師持續鼓勵，煦然勸勉，徬徨的我最終還是走向學術的殿堂，高老師對學生無求的付出，銘感在心。陳麗桂老師、劉瑞箏老師是我大學時期十分敬愛、深受啟發與慈愛的學者，黃麗娟學姐則在碩一時對我時加提攜，良師眷顧，何其有幸！

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謝謝林聖峰同學提供我許多意見與幫助，張博鈞同學、劉原州同學、陳鈺玟學妹都替我處理不少鞭長莫及的繁瑣事務，尤其各校書籍無法充分流通，更使得他們友情的支持特別珍貴。還要感謝一心愛護我以及體諒我的同事、學生們，教學相長，足以發之。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對我無怨的付出，在學業事業兼顧之際，不致健康摧敗，若有榮華，全歸之於家人的辛勞。

人生茫茫，未知下一個里程碑在何處，師長們皆鼓勵我繼續深造，然而一己讀書之事，卻需勞煩那麼多人襄助，又使我躊躇，既濟未濟之間，盱衡未已，待時而動，但願盡其在我，不負慈愛，無愧於心而已矣。

黃惠香 謹誌於台中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古史辨對《周易》研究方向的引導	15
第一節 古史辨討論《周易》的方式	15
第二節 肯定《周易》的占筮性質	28
第三節 經傳分觀的主張	31
第四節 啓發「考古易」的重視	37
第三章 古史辨與《周易》古史研究	47
第一節 源流略說——「引史證易」和「易中有史」	48
第二節 顧頡剛與《周易》古史	52
第三節 余永梁與《周易》古社會史	63
第四節 李鏡池與《周易》古史	67
第五節 略論近代《周易》古史學的發展	74
第四章 古史辨對「商文化和《周易》關係」之探討	77
第一節 商周兩民族文化的探討	78
第二節 商代「龜卜」與「易」的探討	81
第三節 從出土文物再看商代「龜卜」與「易」的探討	86
第四節 李鏡池的《周易》「貞」字解	94
第五章 古史辨對《周易》經文的析論	103
第一節 《周易》的著成時代背景及編者	104
第二節 八卦與重卦	110
第三節 經文內容的分析	117
第四節 《詩經》對《周易》研究的影響	125
第六章 古史辨對〈易傳〉的看法	135
第一節 孔子與《周易》的關係	136
第二節 論〈繫辭〉傳古史與觀象制器說	141
第三節 〈易傳〉略論	145
第四節 〈易傳〉作於道家思想濡染的儒者	150
第七章 結 論	161
第一節 古史辨在《周易》研究上的成就	161
第二節 古史辨在《周易》研究上的局限	168
第三節 古史辨《周易》研究的評價	174
參考文獻	183

第一章 緒 論

一、釋 題

本書題名為「古史辨《周易》研究評議」，研究範圍以《古史辨》第三冊上編為中心，並旁及李鏡池後續相關著作，以及近代對古史辨《周易》研究的回應，以求呈現古史辨時代上的意義和價值。「古史辨」三字未使用書名號，乃因《古史辨》唯第三冊上編專收《周易》研究，若使用書名號，似指《古史辨》全七冊，不符本書研究範圍。

本書題名略有研究「古史辨派」易學的意味，但考慮古史辨難以成為一個嚴謹的派別，主要是因為古史辨不是家學，並不宣揚不可侵犯的黨同伐異態度，亦未有明確的組織或成員，也無成立學會或特定的學堂講學以動眾。在顧頡剛掀起討論古史的風潮後，任何人只要共同參與討論，都能夠助成古史辨以新史學的姿態檢視古典文化遺產，即使是文章收錄在《古史辨》中的人，也可能是持完全反對意見的人，或者是對古史辨本身的批評。因此，要將文章收入《古史辨》的學者都視為「古史辨派」，恐不可行。若要強指出誰是「古史辨派」的學者，在《周易》研究上，顧頡剛和李鏡池是肯定的兩位，而即使以師生相稱的兩位，在某些議題上，顧、李二人也未完全彼此同意。權衡之下，簡題「古史辨」三字，於後文中使用「古史辨學者」一詞時，亦未特指某一人，乃是指遵循古史辨考校古籍道路者，方法上不以道德權威為論據，信而有徵、疑而能辨。顧頡剛亦自承古史辨不是一個派別：

我的意思，疑古並不能自作一派，因為他們所以有疑，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標準，凡是不合於這標準的則疑之。……我寫出許多古文論文，原為科學工作，並不在求青年擁護；青年願

意接近我的，我只期望他在這一堆亂蓬蓬的材料裡，清理出一個是非的標準，在學問上自求進展，對於我所說的如有錯誤，極盼望人們的駁詰。我絕不像廖平、康有為那樣，自居於教主而收羅一班信徒，盼望他們作我的應聲蟲。〔註1〕

因此，「古史辨學者」一詞，僅是概念性的指稱，特此注明。

至於命題「評議」而不以「平議」者，筆者初窺堂奧，自歎不足，不敢妄以「平議」自居，恐仍有主觀而為之，故以「評議」名之，淺陋之處，亦祈方家斧正。

二、文獻評述

研究顧頡剛及古史辨的先鋒著作，當數及1974年德人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書名的副標是「民族主義與取代中國傳統方案的探索」，可查知施耐德對顧頡剛在近代中國史的轉型時期所佔有的地位，極為看重。此書主要的內容「係討論顧頡剛一生的學術成就，而非以古史辨運動為主要論題。其長處是掌握了顧氏一生各階段學術研究之變貌：由疑古、歷史地理，而審慎釋古的過程。但此書在討論顧頡剛與民俗運動時，太過強調民眾觀點，反而忽略了它與古史研究的血肉關連」。〔註2〕關於古史辨曾走向辨古書真偽的道路，文中只提到《詩經》的部分，認為「一些校勘學家（顧頡剛乃其中較著者）把居群經之首的詩經從貴族文化傳統中營救出來，用嚴謹的態度加以整理，使詩經成了中國民歌之祖。」〔註3〕也由於對民俗學的看重，因此在古史辨《詩經》研究和民俗學的結合尚有幾小節的析論，而於古史辨《周易》研究部份則略而不談，足見其未關注《周易》研究。

1986年劉起鈞的《顧頡剛先生學述》，是第一本全面講述顧頡剛一生治學的著作，劉氏為顧頡剛弟子，對顧氏生平知之甚詳，因此本書甚有史料學的價值。而全書的重點也在於完整描述顧頡剛在史學運動的主張，然意識形態甚為強烈，似有不足。

〔註1〕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見氏著《我與古史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216。

〔註2〕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5。

〔註3〕 〔德〕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與取代中國傳統方案的探索》（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年），頁189。

1987 年王汎森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此書主要著眼於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的因果關連，對清季今文家與古史辨運動的關係論述頗詳。」〔註4〕全書在第四章「顧頡剛與古史辨運動之興起」中，才論及顧頡剛的學術表現，於「經書歷史性與倫理性之衝突」一節，討論古史辨對《詩》、《易》、《春秋》三書的析辨：

在對這三部經書的辯論中，最明顯的特徵是聲明它們都被漢儒嚴重扭曲了，而現在是要把被扭曲的回復原狀的時候了。這可以分成三層來說：

1. 漢儒把《詩》、《易》這些古代史料說成是聖人有意編排而成的道德教化之書。所以像《詩經》中原本是沒有什麼深意的詩篇前後秩序，也被渲染成有深刻的用意寄寓其中，也就是把詩篇澈底儒理化了。爲了牽就倫理化的要求，同時把詩篇的歷史性澈底扭曲了。
2. 漢儒爲了宣揚聖人構作人文世界之說，所以出現「觀象制器」的說法，認爲沒伏羲的畫卦，整個中國的人文發展便成了不可能。
3. 在顧頡剛看來：經書經歷過了漢朝的大「合」，把許多不相干的文獻附到「經」，又把「經」全部歸給孔子，並強調孔子寄深刻的意旨於其間。現在是到了大「分」的時候了。〔註5〕

並在第 252～257 頁討論了「《周易》是中國人文化成的總根源嗎？」概述顧頡剛抨擊〈易傳〉和肯定《周易》爲卜筮之書，標舉顧氏以此二論題爲著力點，搖撼《周易》在中國文化思想上經書之首的權威性。依全書規模而言，這樣的篇幅是少了點，但這是專著作品中，首見對顧頡剛考辨古書工作予以討論，顧頡剛對《周易》的影響，首次進入了歷史學家的視野。

歷史學家對顧頡剛和古史辨的分析，大致皆如此，較少提及古史辨對《周易》的重大影響。研究古代經典的學者則較多措意於此，國共分離以來，早期由於政治情勢的緊張，以及政治力對於學術的干預，海峽兩岸對於古史辨的《周易》研究成就，鮮少予以肯定，或以「疑古」、「虛無主義」嚴厲斥責。至政治氣氛較鬆綁之時，對於古史派疑而後信的精神有較多肯定。

〔註4〕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5。

〔註5〕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1987年），頁242。

1983 年鄭良樹爲《續偽書通考》作以代序的〈論古籍辨偽學的新趨勢〉時，認同古史和古籍辨偽之間不宜脫鉤，「顧頡剛雖然在古史方面建立績業，不過，他同時也整理及刊布了不少古籍辨偽學的書刊。從事古史研究的人，固然不可忽視古籍的真偽；從事古籍辨偽的人，也應知其對古史的影響和震撼力量。」〔註 6〕概述古史辨接受清代今文經學家的影響，並且提出當時考訂古史在方法上有四個缺點：（一）用「丐辭」來論斷〔註 7〕；（二）用「思想系統」來論斷；（三）用「引例」來論斷〔註 8〕；（四）證據可靠的程度。鄭良樹以爲，古史辨的缺失在後來已漸漸改善，學術已由粗而細的進步發展。〔註 9〕在全書之首考辨經部時，即舉高亨、屈萬里、張立文、李漢三、張岱年等學者之說考信《周易》經傳，可說間接肯定了古史辨對《周易》考信有創始之功，使後來學者續有創發。

近二、三十年來，歷年易學的研究受到重視，先有 1970 年以來的高懷民《兩漢易學史》、《先秦易學史》、《宋元明易學史》等一系列著作，又有 1986 年以來朱伯崑的《易學哲學史》。此兩套書都未敘及近代易學研究，故未專就古史辨的易學研究探討，但在先秦部分，不管立場如何，皆回應了古史辨所啓發的議題。

至 1991 年廖名春、康學偉、梁偉弦等人所著之《周易研究史》，於第七章「現代易學」中，始確立古史辨發動近代易學第一次熱潮的地位。〔註 10〕書中所討論的現代易學，上起民國初年，下迄八十年代末期，總括現代易學共出現四次熱潮，首次的熱潮「將易學研究從封建經學中解放出來，引進新思想、新方法治《易》，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後半個多世紀的易學，很

〔註 6〕 鄭良樹編著：《續偽書通考》（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19。

〔註 7〕 鄭良樹引用胡適的說明：「在論理學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證明結論預先包含在前提中，只要你承認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認那結論了；這種論證叫做丐辭。譬如有人說：『靈魂是不滅的，因為靈魂是一種不可分析的簡單物質。』這是一種丐辭，因為他還沒有證明（1）凡不可分析的簡單物質都是不滅的，（2）靈魂確是一種不可分析的簡單物質。」同上，頁 29～30。

〔註 8〕 「將後人引書例強加古人身上，並且藉以作學術上的推測，是有其危險性的。」同上，頁 31。

〔註 9〕 鄭氏以爲 50 年代以來，古籍辨偽有四種趨勢：一、在態度上漸趨平實；二、在方法上漸趨嚴密；三、在論斷上漸趨謹慎；在論證上漸趨周備。同上，頁 34～49。

〔註 10〕 廖名春、康學偉、梁偉弦：《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頁 400。

大程度上都受了這一討論的支配和影響。現代的考據易學，可以說是直接從這一討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的新義理派，其發展和這次討論的推動也是分不開的。例如用歷史唯物論和辨證法的方法闡發《易》理，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討卦爻辭的內容。」〔註11〕概括評價古史辨的貢獻、影響與弊病。

2000年出版的楊慶中《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則以古史辨突破了經學家的易學研究，開創新觀念、新方法、新話題，「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起到了解放思想、破舊開新的作用。因此，被不少易學名家所認同。其中的有些問題，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仍然一度成為易學研究的熱點。影響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註12〕更加直接明白的以古史辨為新易學的起點。由此可知，在政治力對學術趨於鬆綁的現代，古史辨的重要性就愈能被客觀地加以評議。

三、研究動機

論古史辨運動的成就鮮少提及《周易》，但新世代的易學研究卻要從古史辨開始。

承上所敘，討論古史辨運動的專著鮮少敘及其對《周易》的貢獻。事實上，古史辨運動原本就是討論古史的，和《周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學者們論古史辨運動，《周易》研究自然非其所要。古史辨之所以和《周易》研究產生關係，導因於顧頡剛認為，要將古史考訂清楚，就需將古書的真偽辨明，因為自古以來，古史的建立全仰賴經書，即司馬遷對古史真偽取捨乃以六經為基準的精神。《周易》在漢代以後有經書之首的光環，〈易傳〉中又表露出所有的人文化成乃由《易》而來，其中蘊含的古史，順理成章進入顧頡剛考核的範圍。顧氏無懼於「古史辨」成了「古書辨」之譏〔註13〕，匯編《古史辨》第三冊上編，集中火力為新世代的《周易》研究投下震撼彈。

將《周易》研究劃下傳統與新世代分界點的，正是古史辨。如學者所言，新世代的《周易》研究，最重要的特點即是突破以古人注疏為尊的常例：

本世紀中國學術界對《周易》的詮釋，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突破了二千餘年的這一種主流的詮釋架構。……單就《周易》而言，無論是漢魏儒者透過施、孟、梁丘、京房等《易》家學說詮釋《易經》，

〔註11〕廖名春、康學偉、梁偉弦：《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頁401。

〔註12〕楊慶中：《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14。

〔註13〕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點。

抑或是元明儒者藉由程朱體系解釋《周易》經傳，絕大部分的學者都視《易經》為蘊含聖人至理的寶典，而必須透過疏釋某一層或某二層的經部文獻，以求迫近《周易》的核心道理。而本世紀治《易》的學者，則不再像傳統大部分學者那樣，抱著「《易》歷三聖」的觀念看待《周易》，或以發揮舊注舊疏的義訓為務。大部分的學者都以歷史的眼光或哲學的觀念，將《周易》經傳及一切衍生發揮出來屬於《易》學範圍材料一例平等對待。〔註14〕

這就為新時代的易學開創出最不同的道路，等於將兩千多年的貫例一次全數拋開，劈出一個沒有圍欄的新世界。因此廖名春和楊慶中論現代易學時，一定要從古史辨先敘起。

然而論者每將古史辨的論述和唯物史觀學者相提並論，實因在當年二者皆能對相同的議題進行討論，並且交互詰辨，廖名春等人所著的《周易研究史》所言的第一波易學研究熱潮，即將古史辨學者和唯物史觀學者討論的成果一同呈現。楊慶中也將「古史辨派」與「唯物史觀派的易學研究」同列一章進行評價，徐芹庭將康有為、梁啟超、郭沫若、顧頡剛等人皆視為疑古派，並不加以區別。〔註15〕郭沫若將唯物史觀引入《周易》研究，自然有一定的貢獻，不過顧頡剛本人並不特別推崇唯物史觀，他作於1932年的文章寫道：

又近年唯物史觀風靡一世，就有許多人痛詆我們不站在這個立場上作研究為不當。他人我不知；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我感覺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蹟、書籍真偽，需用於唯物史觀的甚少，無寧說這正是唯物史觀者所亟待於校勘和考證學者的借助之為宜；至於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其基本觀念。唯物史觀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內都滲入些。〔註16〕

因此，當時兩者在《周易》研究上雖互有論駁，但顧頡剛始終未將之收入《古史辨》中，若要將古史辨的貢獻和路線更加彰明突顯，則須與唯物史觀學者所敘區隔開來，本書探討古史辨在《周易》研究上的成就，所據資料即以《古史辨》第三冊上編為中心，茲羅列其所收篇目如下：

〔註14〕鄭吉雄：〈從經典詮釋傳統論二十世紀《易》詮釋的分期與類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0、21期合刊，頁175～242。

〔註15〕徐芹庭：《易學源流》（台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頁1339～1357。

〔註16〕顧頡剛：《古史辨》第四冊，顧〈序〉，頁22。

- 一、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故事〉
- 二、顧頡剛〈論易繫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
- 三、疑古玄同〔註17〕〈論觀象制器的故事出京氏易書〉
- 四、馬衡〈漢熹平石經周易殘字跋〉
- 五、疑古玄同〈讀漢石經周易殘字而論及今文易的篇數問題〉
- 六、胡適〈論觀象制器的學說書〉，附顧頡剛〈跋〉
- 七、錢穆〈論十翼非孔子所作〉
- 八、李鏡池〈易傳探源〉
- 九、李鏡池〈論易傳著作時代書〉
- 十、顧頡剛〈論易經的比較研究及彖傳與象傳的關係書〉
- 十一、李鏡池〈答書〉
- 十二、余永梁〔註18〕〈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
- 十三、李鏡池〈左國中易筮之研究〉
- 十四、李鏡池〈周易筮辭考〉
- 十五、容肇祖〈占卜的源流〉

共有八位作者，十五篇文章，並旁及相關資料，如李鏡池乃是此次古史辨討論中，唯一對《周易》持續討論的易學家，因此李氏後期著作有相關者，亦

〔註17〕錢玄同，原名師黃，字德潛。辛亥革命前，改號漢一，改名夏，別號中季。五四運動前，改名玄同。在古史辨運動中，號疑古，自稱疑古玄同。時人譏諷錢玄同改姓為疑古玄同，可能肇因於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中寫道「玄同先生于十四年八月中廢錢姓而以疑古玄同為名，故目錄中亦隨了改題，先後不復一律。」（《古史辨》第一冊，頁7。）不過錢玄同自己的說法是：「以前將號與名合寫為『疑古玄同』，遂有人說我改姓『疑古』。今後有時或將為『掇獻玄同』，大概又有人要說我改姓『掇獻』了」（轉引自吳銳：《錢玄同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226。）足見錢玄同自己是認為「疑古」為號，而非廢去錢姓，顧頡剛和錢氏交誼甚好，至於當初在古史辨第一冊中何以這麼寫，錢玄同是否有不滿，則不得而知。

〔註18〕余永梁之生卒年不詳，筆者所及資料，見於鍾敬文1936年在東京所寫〈天問室瑣語〉：「余君，四川人，年輕而湛於學。嘗師事故王國維、梁啟超二氏。於古文字學，頗有創獲，所作詩詞亦清俊。與余同供職嶺表某大學，游息與共，洽好軼儕輩。不久，余離職北上，余氏亦擬赴歐洲，為中央研究院鈔影敦煌石室古文獻。詎意將行前，遽以狂疾聞矣。彼在浙江莫干山及滬上療治時，余曾一再往探之。後卒為其家人挾以西歸。及今數載，杳無訊息。西土荒落中，故人其尚健在耶？每展示彼手迹，或讀其見貽詩章，輒為惘然久之。」鍾敬文：《芸香樓文藝論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年），頁14～15。

加以收錄，以表現古史辨其一貫精神與遷衍。

如余英時所言：「今天大陸上一部分有勢力的史學界似乎又在倡導『信古』，反對『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問津者。」〔註19〕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抹滅了古史辨在《周易》研究的努力，現今的易學研究會是怎樣的面目？而古史辨在《周易》上的研究，是否就是如此過時，令人迫不及待的走出？若是如此，該走出的是什麼？該留下的又是什麼？古史辨既為新世紀易學初祖，應該有些優點值得再三回思，因此，若能將伐毛洗髓、去蕪存菁，或能為當今的易學研究再有啟發。

四、略述古史辨運動

古史辨的學術思想深受時代影響，從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次近代重要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由舊趨新，在在醞釀了古史辨成為時代風潮的可能。古史辨的中心人物是顧頡剛，察其學術淵源和社會歷史背景，可知其批判繼承了傳統固有的疑古精神、清代學術成果，感染五四時代精神，又受到20世紀以來史學求新的思潮影響〔註20〕，得以繽紛錯彩，斐然成章。

顧頡剛自述古史辨產生的歷程，最重大的轉捩點在1917年胡適被蔡元培聘入北大，接替陳漢章講授《中國哲學史》。運用西方的科學方法重編講義，以《詩經》作時代斷限，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顧頡剛深受啟發。此後追隨胡適整理國故運動〔註21〕，而後走向古史研究，成為

〔註19〕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2007年），頁21。

〔註20〕近代史學的發展變化，特別是五四時期史學思潮，對顧頡剛的影響，除了史學觀念方面之外，更表現在史學思想上。「這種影響很明顯地表現在他對新的進化史觀的運用，表現在他的學術研究選題上所具有的關注社會和國家命運的責任心和注重普通民眾思想傾向，表現在他要探討古史系統中運用多學科方法把古史與民俗學作打通的研究等等方面。在顧頡剛古史、民俗、邊疆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中，都能尋出五四時期這次全面求新的史學思潮的蓬勃發展給他打下的鮮明的烙印。」見劉俐娜：《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頁160。

〔註21〕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國故」運動，這對顧頡剛有重大啟示：整理國故運動不僅提出了辨偽的任務，還提供了古史考辨的障地，有效地幫助古史辨派的先驅者擺脫儒家經學的羈絆，破除對古史的迷信，把古史和古書中崇拜的偶像，變成重新評判的研究對象，促成了古史辨派思想的醞釀和產生。整理國故運動，因其本身所具有的懷疑主義的性質，自然而然地

疑古思潮的領袖。古史辨的發生和胡適有重大關係，胡適談及當初要顧頡剛標點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這一提議竟成為古史辨派產生的契機：

承顧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個字的短信作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這四十八個字居然能引出這三十萬字的一部大書，居然把顧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終身事業的大路上去，這是我當日夢想不到的事。〔註22〕

胡適之外，錢玄同的襄助亦功不可沒。錢玄同先從學於古文家章太炎，後師從今文派的崔適，因而今古文兼通。但錢氏對今、古文家都不滿意，鼓勵顧頡剛大膽疑古，不僅要辨僞書，還要辨僞事，同時要取法治子學的存疑態度，對經書辨僞。〔註23〕之後顧頡剛的辨僞工作從原先的「推翻僞書中的僞史」進展到「推翻真書中的僞史」。錢玄同對顧頡剛影響深遠，余英時認為錢氏兼通今古文，又兩者皆批評，使顧頡剛治學擁有破壞力極強的武器：

錢氏對他說：「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相。」這個近乎虛無主義的觀點後來就變成顧氏辨古史的一個最重要的銳利武器了。〔註24〕

總之，如顧頡剛所說：「要是適之玄同兩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僞材料的興趣，獎勵我的大膽的假設，我對於研究古史的進行也不會這般的快速。」〔註25〕在胡適、錢玄同這些良師益友的啟發和鼓勵下，顧頡剛突破傳統，創立了震動

成了現代疑古思想的原動力，對此顧頡剛曾多次談起：「整理國故的呼聲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軔於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劃。我生當其頃，親炙他們的言論，又從學校的科學教育中略略認識科學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覽而對於古今學術有些知曉，所以能夠自覺地承受。」正是在「此種空氣之下，踴躍用命，也想一口氣把中國史弄個明白，便開始從幾部古書裡直接證明堯舜禹的真相。」見吳少珉、趙金昭主編：《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8~9。

〔註22〕 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古史辨》第二冊，頁335。

〔註23〕 錢玄同致書顧頡剛，說道：「我以爲『經』之辨僞與『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過之。因爲『子』爲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爲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麼，總要徵引它、信仰它，（直到現在，還有人根據《周禮》來講周史的！）故『僞經辨證集說』之編纂尤不容緩也。」錢玄同：〈論編纂經部辨僞文字書〉，《古史辨》第一冊，頁41。

〔註24〕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59。

〔註25〕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頁80。

一時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

「層累古史說」公諸於世，始於胡適《讀書雜誌》約稿，顧頡剛將給錢玄同的信截取了下半篇，加題〈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在《讀書雜誌》第九期上，正式向學術界公布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對既有傳統古史觀與古史資料進行新面向的討論，並在社會上引起注意，造成廣大反響，當時贊成的文章寥寥無幾，反對的浪聲高漲，彼此往來論辨的文字多達八萬。^{〔註26〕}1926年6月時，顧頡剛集結討論古史的論文和信件，出版古史辨第一冊，標誌著古史辨風潮的正式崛起。

顧頡剛自己總結這次辨論古史的運動興起的背景是：一、史學上尋源心理的發達；二、西洋的科學治學方法和新史觀的輸入；三、清代中葉以來疑古學的漸次興起；四、考古學的抬頭。^{〔註27〕}1980年發表的〈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也曾說：

我的學術工作，開始就是從鄭樵、和姚崔兩人來的。崔東壁的書啓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恆的書則啓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啓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並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於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啓發和幫助。^{〔註28〕}

以上概括古史辨運動興起的由來和背景，至於和《周易》研究較相關的背景，則於本書第一章說明其詳。

五、寫作方式

要對古史辨《周易》研究的成就進行梳理，並非易事，首先，古史辨處於新舊世代交接之際，觀念的提出常多於實際成就的表現，如學者所言：

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各人持相同或歧異的見解，每每前代學者已零星論述，因此，古史辨運動的意義並不在個別論題上有何創見，

〔註26〕1924年2月，胡適撰文〈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讀書雜誌》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蓁、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古史辨》第一冊，頁189。

〔註27〕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南京：勝利出版社，1947年），頁126。

〔註28〕顧頡剛：《我與古史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197。